

城市與設計學報
第十五/十六期 2003年9月
Cities and Design
No.15/16 September, 2003

全球網絡中的都會區域與城市： 北台都會區域與台北市的個案^{*}

夏鑄九^{**}、劉昭吟^{***}

Metropolitan Regions and Cities in the Global Networks: The Cases of Northern Taiwan and Taipei

by

Hsia, Chu-joe、Liu, Chaoyin

關鍵詞：全球經濟、都會區域（即，城市區域、鉅形城市、城市群、城市連綿區）、全球城市、資訊（信息）化城市、創新氛圍、生態危機、永續城市、社會片斷化、台北

Keywords: global economy, metropolitan regions, city-regions, mega-cities, global city,

informational city, milieux of innovation, ecological crisis, sustainable city, social fragmentation, Taipei

*收件日期：2003年10月28日；通過日期：2004年2月23日。Received: October, 28, 2003; in revised form: February, 23, 2004。

本論文修改前曾發表於兩岸四地城市發展論壇，杭州，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主辦，11月23-25日。由於論文發表篇幅的限制，僅能提供分析的基本架構與結論，論證所需的詳細經驗資料請參考：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2, 11)，修訂台北市綜合發展計劃：全球化趨勢下台北市空間發展目標與策略研訂，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委託。本文初稿曾以“面對全球化過程中台北市的都市現實”發表於第九屆海峽兩岸城市研討會，成功大學主辦，2002年8月24日；期中簡報後的摘要初稿，曾以“全球網絡中的都會區域與城市：北台都會區域與台北市的個案”，發表於社區規劃與合作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一和研發中心主辦，北京，2002年9月27-28日。前兩次初稿由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吳欣隆協助整理資料，後因眼疾，退出工作，由劉昭吟接替工作，是需要註明的。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hchujoe@ntu.edu.tw;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d88544001@ntu.edu.tw

摘要

在廿一世紀開始的此時此刻，全世界的城市和社會都共同正在經歷一個在我們自身結構內的深刻歷史性轉化。全球經濟藉助 1970 年代技術革命的巨大力量，已改變了我們的生產、消費、管理、資訊傳播和思考表達的方式。重要的策略性活動都是在全球決策和交換網絡中被組織，從金融市場到視聽訊息。世界是不對稱，相互依賴地接合在全球網絡中。這就是我們要面對的結構性轉化所透露的新世紀，資訊（信息）時代、全球經濟、與網絡社會。而都會區域（或者說，城市區域、鉅形城市、城市群、城市連綿區）已被視為是廿一世紀的新空間形式。本文則針對全球網絡中的北台都會區域與台北市，面臨前述結構性力量所推動的巨大變局時，它的都市政策研擬首先要面對的都市與社會現實，提出分析。換句話說，這也是一個正在橫渡全球化惡水中的地方政府，摸索它的新角色轉化時必須先面對的地方真實情境。

Abstract

Over the worl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ities and society are undergoing a deep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ir structure. In terms of the huge capacity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1970s, the global economy has changed the ways of our production, consumption, management, informing and thinking. The strategically dominant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in global decision-making and exchange networks, from financial markets to audiovisual messages. The world is asymmetrically interdependently articulated into the global networks. This is the new century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we have to face, i.e.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network society. And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or city-region, mega-city etc.)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new spatial for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acing the tremendous changes in glob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its urban restructuring,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Taipei city as a global city and the Northern Taiwan as a metropolitan region. This is the necessary analysis of the urban and social reality for proposing urban policies in the future. In other words, this is also the local real situation for a local government crossing the trouble water of globalization to search for its new role in state transformation.



1. 前言：沒有城市的都市化與都會區域成為新的空間形式

在廿一世紀開始的此時此刻，全世界的城市和社會都共同正在經歷一個**在我們自身結構內的巨大歷史性轉化**。在這樣的轉化核心是環繞著資訊（信息）技術所組織起來的技術革命。立基於新技術的基礎設施，經濟與傳播的全球化過程已改變了我們生產、消費、管理、資訊傳播和思考表達的方式。事實上，並非世界上每一種經濟或文化活動都是全球化的。到目前為止，以參與者的比例而言，大部分的活動在領域上仍都是地方性或區域性的。然而，所有層級的、重要的**策略性活動**，卻是在全球決策和交換網絡中被組織，從金融市場到視聽訊息，世界是不對稱地相互依賴著。¹而這樣的關係經由新資訊（信息）與傳播技術，全球、即時地聯繫起來，這就是我們要面對的**結構性轉化**所透露的新世紀的早期輪廓：資訊（信息）時代、全球經濟、與網絡社會。

都市化過程、城市和市民都在這些結構性轉化過程中改變。當前，其實是歷史上最快速和範圍最廣的都市化過程，預期在很短的時間中，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都將集中在城市中，而那些都市人口中的大多數將會住在現在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中。已有的經驗研究成果已經告訴我們，資訊（信息）時代並不會如同技術決定論者所預言的那般，稀釋城市中心，相反地，**大規模人口的空間集中**，建構出具有**歷史性的新社會空間特徵的不連續體**，被稱為**沒有城市的都市化(urbanization without cities)**，也被視為是這個新世紀的主要**空間形式**。²更根本一點說，我們關心這個新世紀的主要**空間形式**，沒有城市的都市化的形式底下所表現的，網絡社會的城市與社會的結構性轉化到底是什麼？這也就是說，全球經濟正在推動地理空間的巨變，它的**新空間形式與結構性轉化**，是我們整個研究的**疑旨(problematic)**，或者說，認識論的基本發問的起點。

由於全球化的爭議正多，避免過於簡化的，教條式意識形態的無意義爭議，研究的問題要由現實出發。換句話說，全球化在各地的具體狀況都不相同，那麼，**全球化接合當前東亞**

¹ 參考：Borja, Jordi and Castells, Manuel (1997) *Local and Global: Management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Earthscan.

² 這部分關於沒有城市的都市化(urbanization without cities)說法其實就是說：沒有市民的城市，參考：Castells, Manuel (1999) “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Frontiers of the Min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June 14-18; also in Susser, Ida (ed.) (2002) *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p: 367-389.

的歷史現實是什麼呢？我們面對的都市與社會的現實(urban and social reality)是：台灣經歷了三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歷史與當前中國決心納入全球經濟的政治與歷史條件，今天我們面對經濟全球化只能順勢而為。本文將指出台北市，或者說北台都會區域處身當前的這個全球經濟的接合過程，關係著國家角色的轉變，更關係著全球網絡選擇性地接通或切斷(switch on or switch off)所形成的社會接納(social inclusion)或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過程。廿一世紀的城市形構與重構可以說是全球網絡裡流動空間的節點之表現。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命運是在都市地區完成演出，特別是在大都會區中，即，全球城際網絡中的都會區域。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全球經濟中這些大都會區形成的與作用的趨勢，被有些學者進一步界定為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s)，或者說，鉅形城市(mega cities)、城市區域(city-regions)、城市群、城市連綿區³等。這是一種新的空間形式。若考量馬克斯·韋伯城市理論的長年傳統，視城市為文化與政治的建造，而將城市(cities)這個觀點保留給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一種社會組織與文化表現的特殊形式的話，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則將廿一世紀的這種新空間形式稱為“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就是為了避免稱其為鉅形城市(mega-city)⁴或城市-區域(city-regions)⁵可能帶來的誤解。此處的都會區域，稱為“區域”(region)，指涉散佈在廣大領域內，經常以特定的勞動市場、消費市場、與媒體市場（如電視）的角度加以界定的功能性連結。⁶

都會區域不只是一個十分大的都市地區(a very large urban area)。在大部分的情形裡，都會區域都沒有名稱，更遑論政治上的整體或是制度上的機構。這些聚落模糊了傳統的城鄉區分，城市與城郊區分。它們包括了空間上的不連續性，不同密度的建成區、開放空間、農業活動、自然區、無邊的住宅區…集中了服務與製造活動，沿交通軸散佈，以高速公路與大眾捷運系統組成。當工作、居住、與商業，按不同的方向散佈開來，沿襲著過去習見的都市蔓延，城市與城郊區分模糊，沒有真正嚴格的分區意義。

更有甚者，這些區域經常以主要中心城市為核心，較小的都市中心，漸被吸進都會區內

³ 例如周千峙對2002年11月在杭州舉辦的兩岸四地城市發展論壇的主題說明文。

⁴ 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將廿一世紀的這種新空間形式稱為“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是為了避免稱其為其自己在1966年的書裡所稱的“鉅形城市”(mega-city)以引起對“城市”一詞的誤解，見：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ch.6.

⁵ 例如：Scott, Agnew, Soja, and Storper, (1999) “Global City-Regions”, Them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Global City-Regions, UCLA, 21-23 Oct; Scott, Allen (2000)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ity-Regions”,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ies Group and Network Research Bulletin 26. or, Scott, Allen (eds.) (2001) *Global City-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1-32.

⁶ 參考：Castells, Manuel (1999) “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Frontiers of the Min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June 14-18; also in Susser, Ida (2000) *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373.

部的網絡中。當分散化企業/工業活動在某些地區集中時，新節點即不斷地浮現。其他地域則相當程度地以提供都會人口服務的角色成長。

這個區域的都會結構全然有賴於運輸與傳播通訊。離家的遠距工作，或是工作與居住之間的區位在空間上分離都相當程度地增加。都會區域的特徵是，同時地，**空間蔓延與空間集中，混合的土地使用模式、極度移動性、與仰賴通訊與運輸，既在都會區內，又在節點之間**。它們表現的特色：**極端的空間片斷化、社會隔離、難以置信的尺度空前的環境問題**。⁷

在台灣，如「北台都會區域」，⁸這是作者在全球化趨勢下思考台北市的都市現實時，必須不能侷限於現有北市行政轄區思考現實的首要條件。這也就是說，北台都會區域如何接合全球經濟是我們分析的理論角度，才有可能不昧於全球巨變的現實。

如何管理城市並建立能夠回應新生產與文化形式的新生活模型是一項挑戰。不只是由於積累了人類聚居新類型(a new type of human settlement)中功能的、社會的和環境的問題，也因爲是我們正面對所知不多的結構性轉化過程。經濟與技術的全球化，經常與社會與文化的地方化相對立，而目前都市政策的訴求又似乎落於時代之後。一般的市政府，經常被其力未能所及的領域裡所發生的事件所超越，地方與區域政府⁹被迫在全球競爭中轉變其原來的角色與功能，被稱爲城市與區域治理體系，或者說，都會治理(metropolitan governance)。因此，重新定義都市政策與管理工具確實是重要的工作。

至於我們的研究過程中的關鍵步驟是：首先，我們審視近年全球化與都市政策相關的研究，分析從下支撐城市轉化之技術、經濟、文化及制度的過程，建構一些「分析性假說」做爲理論的角度，以便接合台灣的具體經驗資料後，進一步提出分析性的全球化趨勢下台北市的都市與社會現實。

本文以我們近年整理、翻譯一些與全球化有關的著作，也不停留於簡單概念定義的介紹性說明，而直接處理近年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辯論，這才能有助於我們直接進入分析對像的核心。全球城市與都會區域可以說是本研究最核心的理論概念，有必要在認識論層次上做較精確的處理。而概念化的初步結果，也就是全球化下空間與社會的結構性轉化的「分析性假說」，可以做爲我們開始研究台北市全球化的起點。

⁷ 上述諸點參考：Castells, Manuel (1999) "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Frontiers of the Min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June 14-18; also in Susser, Ida (2000) *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p.367-389.

⁸ 在調查與分析過程中我們發現過去習用的台北都會區、桃園都會區、新竹都會區的劃分已經不易表達區域中的人口、產業與都市功能的相互關係與台北影響力，因此，為了資料分析上的簡便起見，本文暫時以台北新竹間的區域稱做“北台都會區域”。包括了基隆市、台北縣市、桃園縣、新竹縣市等。更嚴格地說，以苗栗縣的竹南以北來思考當更符合現實。而各都會區域的邊界模糊性，正是都會區域的特性之一。

⁹ 有意思的是，台北市在憲法的地位上是不折不扣的二級政府，也就是區域政府，但是在近年台灣的現實政治中，卻與高雄市一般，其權力卻似乎被有意稀釋為與三級的縣市政府相同的地方政府。

2. 分析性假說

在研究方法上，我們以三點鬆散的分析性假說做為收集經驗資料，指引研究方向，以及進一步理論對話的參考點，它們是：

1. 新的全球經濟是以領域(territory)為措辭環繞著城市網絡 (the networks of cities) 接合起來的，這是都會節點的網絡 (networks of metropolitan nodes)。
2. 資訊（信息）化城市 (informational city) 的關鍵是做為創新氛圍 (milieux of innovation) 的都會區。
3. 片斷化的都會是空間隔離與社會排除的表現。

所有的統計資料（尤其是關於新近服務業部分的資料）、訪談調查、以及既有的相關研究資料，我們都在上述暫時性假說中去重新挖掘與組織，期望最後能進一步界定假說、甚至顛覆既定架構、或是深化其意義的討論。最後，這些結論可轉化為課題，也期望能提供日後政策擬定時一些較堅實的知識工具。

3. 全球網絡中的北台灣都會區域歷史性浮現

當前全球化論述的擁護者，基本上視全球化為特定歷史脈絡下的「新」的、「不連續」的歷史階段，界定跨國公司 (TMCs) 為全球經濟的新作用者之一，那麼在這個潮流下的「新」都市空間形式是什麼呢？英美學者中，泰勒 (Peter Taylor) 與貝佛斯達克 (John Beaverstock) 為首的「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群網絡」(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 GaWC)，以「先進生產者服務廠商的辦公室網絡」(Taylor et al. 2000)¹⁰來定義「全球城市」及其層級性排序之指標；柯斯特 (Castells 2000)¹¹以美國傳統的都會擴張為對比，視中國大陸近二十年的都市爆炸為其與全球化經濟連結的結果，而以地理範圍分散但分工互賴的城市網絡為特徵，柯斯特將此特徵一般化為資訊資本主義的新都市空間形式，強調以網絡與節點的整體性作為認識圖像與分析單元，名為「都會區域」；莎森 (Sassen 2001)¹²以「資源大量集中的領域性區位」與「去領域化的跨界網絡」並存，來進一步說明網絡中分工的城際關係，其一方面表現為彈性生產組織的新生產區位，另一方面藉由全球城市的跨界管控行為，使分散的生產區位能整合運作。

¹⁰ Taylor, P.J., Doel, M.A., Hoyler, M., Walker, D.R.F. and Beaverstock, J.V. (2000): 'World Cities in the Pacific Rim: A New Global Test of Regional Coherence.'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21 (3): 233-245

¹¹ Castells, M.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¹² Sassen, Saskia (2001). "Impa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on Urba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2): 411-418

英美學者的先驅性研究，從全球尺度界定全球化的「新都市空間形式與秩序」，身為後進國/區域之在地研究者的我們，無論是否同意其對空間形式的新界定，對於其以英美經驗為座標，對後進者的角色與作用的忽略，不免抱憾。在我們的研究團隊中，林德福（2003）¹³採用「全球商品鏈」、「越界生產網絡」、「後進者」之概念，來解釋「北台都會區域」的形成。林德福論證，隨著台灣地區人口與就業自 1970 年代以來向北台都會區域集中以及 1980 中期年代以來的產業再結構，北台都會區域以電子業為主領產業，經由產業結構重組與生產基地重組二者互為策略，藉由將成熟產品的生產基地外移至中國大陸、東南亞，自身既向中（電腦組件、被動電子元件）、上游（半導體、光電材料及元件）關鍵零組件，也向新消費產品（筆記型電腦、數據機、光碟片）轉型，北台都會區域不是被動地被安置在國際分工的特定位置上，而是積極參與在全球化經濟的重組中，形成在先進工業國（美、日、歐）—北台都會區域—中國大陸（+東南亞）的全球商品鏈中的中介位置。

而這個主動參與全球化經濟的能力，林德福認為，不僅基於工業生產部門的投入與技術升級，也在於生產者服務業部門所提供的全球運籌管理的能力。金家禾（2001）¹⁴的研究指出，台灣的生產者服務業的發展型態，受限於台灣在全球分工中的代工位置，導致生產者服務業等級較低，衍生服務需求有限，且因產業外移失去服務對象而萎縮，遂難以發展出例如金融、企業服務（會計、法律、廣告、公關、管理諮詢）、設計、以及文化創意等先進服務業，因此「全球連結之能力呈弱化發展」。儘管先進服務業與「全球連結能力」之間的關係，還可進一步論證，在金家禾的經驗研究中，台北都會區卻是台灣各都會區的例外，其服務業統計顯示出較大的成長表現與較寬廣的業別範疇。林德福的研究為這個觀察提出了分析。他指出，隨著北台都會區的電子業的全球化，支持其即時生產的財貨、資金、技術、服務的越界流通，乃是仰賴著外包之服務業廠商所提供的貿易、運輸、專業生產資料（人力、精密儀器、事務性機器）與金融等服務，亦即，運籌管理領域的生產者服務業。正是這類特定的生產者服務業與電子業，共同推動了北台都會區域成為電子業之全球生產網絡的中介節點，而形成北台都會區域這樣的後進者在全球化經濟中的特殊性。

於是，北台都會區域在全球化經濟中及其區域內部的分工，既是產業部門的、也是地理的歷史過程。林德福考察了台灣領導企業的對外投資，將台灣納入全球化的歷程區分為三個階段，我們依據其所描述的內容，加以界定為：（1）1980 年代以前，世界體系下的半邊陲；（2）1980 年代，跨界生產網絡的浮現；（3）1990 年代，後進者的全球生產網絡。圖 1 到圖 3 顯示隨著歷史的進程，台灣領導企業的對外投資呈現投資規模、業別範疇與地理範圍的擴大，其中，生產者服務業的投資在 1990 年代額外顯著，與日益複雜的全球尺度的生產網絡相呼應。迄 2000 年代初，台灣領導企業的對外投資以電子業之整體產業系統（包括製造

¹³ 林德福（2003），《全球經濟中浮現的北台都會區域：後進者全球生產網絡與空間結構轉化之研究（1980-1990 年代末）》，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¹⁴ 金家禾（2001），〈全球化與台灣都會區生產者服務業之發展〉，《都市與計劃（特刊：全球化與地方發展）》，28 (4)：495-518。

的上中下游、以及為其服務的生產者服務業）為主的形態逐漸形成，其空間組織除繼續強化以北美-台灣-東南亞、香港+中國大陸為主軸的越界生產網絡外，更擴延了東南亞與西歐等多個生產節點，而形成後進者主動出擊的全球尺度的越界生產網絡。同時，也由於後進者的主動性，網絡及其節點更加地複雜與動態，並形成節點間的不對稱的互賴，而不是過去所認識的層級性的支配性依賴關係。

4. 資訊（信息）化城市的都會區創新氛圍

當我們注意到北台都會區域的特殊性在於——以後進者之姿成為不對稱互依之全球生產網絡的中介節點，以不斷升級的生產技術與運籌管理能力組織跨界生產網絡——那麼，此特定位置的生產技術與管理技術如何能不斷升級？隨著 1980 年代日本與東亞的經濟成長被部分歸功於其成功地將國際先進技術向國內轉移，以及 1991 年世界銀行總結知識積累的無形投資較實質資本投資更具決定性，「創新體系」便成為焦點議題，包括：已開發國家的科技政策、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政策如何萃取國際技術流動、以及廠商聚集的社會網絡所形成的創新鏈等。都市研究領域的學者如霍爾（Hall, P.）與科斯特則關注城市的都會氛圍的作用，主張城市正是創新的來源，因為城市能使各種元素產生互動，從而產生有利於創新的「合能綜效」（synergy）¹⁵。科斯特意在為「資訊主義」打造論述，視坐落於主要都會地帶的科技城（technopole）與新工業空間（new industrial space）為新時代產物，其特徵為企業家主義與技術創新二者的結合，而其劃時代的新機制為：創新氛圍乃圍繞著資訊流所形塑起來，表現為經由創投資本及資訊流所組織的社會網絡下的創新中心。¹⁶鮑威爾等（Powell et al., 2002）¹⁷的研究，提供我們較具體的圖像與較細緻的分析。鮑威爾等研究美國北加州生技公司與創投資金之間的關係，指出創意（ideas）、金錢（money）、創意—金錢關係，都是最具流動性的，卻也具空間聚集的特徵。他們論證，創投公司提供的不只是錢，也提供公司運作的建議，亦即，有經驗的創投公司提供的是消息、點子與新機會，使得創新的空間實際上是各種重疊的網絡、重組的計畫、個人關係與專業關係、人際互信與聲望等之間的交織，並隨著時間越來越「黏結」在一起，以使關於新機會的可信賴資訊能在個人與專業網絡中進行，並降低不確定性。

然而，隨著特定地區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分工位置的不同，我們相信，結構性位置將影響其創新氛圍的屬性。北台都會區域以電子業以生產升級見長於全球生產網絡，其中介節點位置使其具備技術流通、承上啓下、以及主動開發部份新技術的功能，其技術取得的管道，

¹⁵ Hall, P. (1998), *Cities in Civiliza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91-309, 483-500; Castells, M., 2000: 419-421

¹⁶ Castells, M. 2000: 422-424.

¹⁷ Powell, W. W., Koput, K. W., Bowie, J. I. and Smith-Doerr, L. (2002): The Spatial Clustering of Science and Capital: Accounting for Biotech Firm-Venture Capital Relationships. *Regional Studies* 36 (3): 291-305

包括了公司間的技術移轉、逆向工程，或技術人員的社會網絡，或政府研究機構的特定研究計畫，或公司部門的研發合作，以及，1990 年代中期以來也在北台都會區域被廣受重視的制度：創投資金。而我們則試圖理解，這個新趨勢的創新機制在北台都會區域的特殊性為何？與北台都會區域的全球化過程的關係為何？

基本上，台灣的創投資金大部份集中於北台都會區域，其角色有二。首先，創投資金本身即為金融商品，以出售實現其商品價值。金融商品鏈中，承接創投資金的買者為股票市場，這使得創投資金所投資的新創公司以上市上櫃為主要目標，而不見得以資金與知識皆既密集又需時的創新活動為主要標的。其次，台灣的創投資金主要來自傳統製造業或電子業的轉投資，因此其投資對象多與其資金來源的領導公司相關，而形成企業集團。對於領導公司而言，將其所掌握到的訂單分配給其所轉投資的創投公司所投資的新創公司，不僅可掌控生產網絡，又可使自身的財務報表顯示出營業額增加、資本額降低而有利於股價，且可分散公司營運風險；而對於新創公司而言，由於分享到領導公司的訂單，有利於上市所需表現的業績，而上市前，領導公司還可刻意安排業績（所謂的「灌業績」）以有利於股價。¹⁸

因此，在北台都會區域，創投資金並沒有投資在需長期研發的未知的、原創的新產品，創投資金也非如北加州模型地成為各種消息、機會、點子的重疊網絡。北台都會區域的創投資金所連結的社會網絡，有清楚的產業路徑可循。由創投資金所帶領的新創公司，其實是領導企業全球化佈局的一環，在由圍繞著領導企業的資金流、訊息流所形成的生產網絡中，實現創新，而聚焦於製程與運籌管理的創新。此正是北台都會區域在全球化過程中，其資本市場與企業創新的關係的特殊性。這個創新氛圍的關鍵作用者，是進行全球化的越界投資的領導企業，其創新投資集中於製程與運籌管理，而不是新產品或符號消費的原創性；但此種原創的限制，也並不是金家禾（2001）所謂的代工模型的結果，它其實更為動態，是北台都會區域的企業在主動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為強化其作為全球生產網絡之中介節點的能力，既被結構限制、也主動選擇了符合其全球化策略的特定的創新機制。

5. 片斷化的都會

直到現在，我們所討論的帶領區域擠身為網絡節點的作用者，都是企業家。這個社會的其他一些人呢？這個再結構過程對他們的影響為何呢？社會學者們關注歷史積累的不平等社會關係，在全球化過程中，因福利國家衰退而減少集體消費，以及圍繞著資訊流形塑新社會關係的影響下，將加速社會的片斷化(fragmentation)，資訊（信息）富有者和資訊（信息）貧困者之間所形成的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遂成為動態而多面向的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新結構。北台都會區域的社會片斷化問題，則因其在全球分工中的結構性位置受

¹⁸ 參考：吳欣隆（2002），工作報告；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3），《修定台北市綜合發展計畫：全球化趨勢下台北市空間發展目標與策略研訂》，夏鑄九主持，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委託

阻而惡化。

2000 年以來的各項經濟統計，呈現各項產業之貿易額、銷售額皆負成長的退現象，其中北台都會區域賴以維生的電子業的衰退尤為顯著。與製造業發展息息相關的生產者服務業、與所得及消費能力息息相關的消費者服務業、文化性服務業，也同樣呈現銷售額的衰退，其中與運籌管理相關的生產者服務業則衰退得更為嚴重。¹⁹這顯示著 2000 年以後的北台都會區域，面臨的不僅是電子業衰退的問題，也是作為網絡節點的功能的逐漸喪失。1990 年代較為和緩的兩岸關係下，產業儘管大舉對中國大陸投資，但並未導致北台都會區域自身產業的萎縮，反而在規模擴張了的全球生產網絡中升級，並且成為網絡中的節點；然而，2000 年新政府執政後的去中國化政策，阻斷了產業與全球生產網絡的連結，不僅加速企業外移，並因連結不順暢而導致台灣自身發展的衰退，而種種對廠商赴大陸投資的管制所留下的幾家大廠（例如半導體廠商），設若政治的邏輯再傷害到台灣企業所需的全球連結的話，將失去以中國大陸市場規模進行產業升級的歷史機會，既有的技術優勢與企業競爭力也將難以持續。

節點功能的流失，反映在失業問題上。1997 年到 2002 年 9 月，台灣的失業率從 2.72% 提高到 5.32%，各縣市的失業統計也顯示整體性的失業加劇。由於位於整個台灣的經濟核心，台北市的就業結構呈現專業、高教育程度、高受雇比例，使得台北市的失業率較其他縣市不嚴重；但其偏高的失業者年齡結構，則顯示其中高齡失業人口除了製造業衰退的因素之外，企業管理扁平化發展亦是重要因素之一²⁰。不景氣、失業引發的風險是邊緣化甚或排除。主計處 2001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顯示，由於不景氣與失業繼續惡化，台灣地區前五分之一高所得家庭的收入仍呈 2.1% 的成長，但後五分之一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已大幅減少 11.4%，而戶內無人就業的家庭也持續增加。影響所及，低所得家庭在購買住宅、教育投資上都陷入了不可逆的惡性循環。而高所得家庭對於「資訊擷取」的較多投資，使得 82% 的高所得家庭都有電腦，而擁有電腦的低所得家庭只有 12.8%，導致高所得家庭的子女有更多的管道吸收資訊、了解外界世界，更有機會培養自己發展跨領域專長，更受市場歡迎，即使不景氣來臨時，亦較容易轉換跑道；然而，基層勞工多數只擁有一種技術，在勞工跨界移動的趨勢中，被取代的機會相當大²¹，而很容易被邊緣化，使得「排除過程的本質是動態且多面向的，不只是和失業、低所得有關，同時也和住宅條件、教育機會、健康、歧視、公民權以及地方社區整合有關」²²。

與失業同時發生的是，外籍勞工的移入。台灣自 1991 年起正式開放民間六行業十五職種引進外籍勞工，迄 2002 年 6 月共有總數 30 萬 7 千餘位來自東南亞五國的外籍勞工在台，

¹⁹ 統計資料請參考：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3），《修定台北市綜合發展計畫：全球化趨勢下台北市空間發展目標與策略研訂》，夏鑄九主持，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委託

²⁰ 參考黃慧玲（2002），工作報告。統計資料請參考：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3），《修定台北市綜合發展計畫：全球化趨勢下台北市空間發展目標與策略研訂》，夏鑄九主持，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委託

²¹ 參考周慧如，〈低所得家庭越來越難翻身〉，中國時報 2002 年 8 月 26 日，第 6 版；于國欽，〈失業攀升，低所得家庭出現負儲蓄〉，中國時報 2002 年 8 月 26 日，第 6 版。

²² 引自 1994 年歐洲社會政策白皮書。

其中超過 8 萬在台北縣市工作。在 1990 年代開放以前，以美國、日本籍所佔的比例最高，兩者合占總外籍人士的半數；到 2000 年時則有三分之二比例為來自東南亞地區（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的外籍勞工，並使台北市的外籍人口轉變成以女性低技術勞動力為主，約七成從事監護工、家庭幫傭等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其次營造業約占兩成，其餘才服務於製造業。²³然而，經濟上的外勞移入增加，與政治上的本土論述的同時發生，使得認同政治建構的族群中心主義逐漸成型。國家外勞政策的首要原則是社會隔離，造成外籍勞工在全球經濟分工中的商品化和在地生存經驗的片斷化。對於沒有公民權的外籍勞工，公部門所提供的權利保障、福利服務十分有限，而法令與勞動契約共同強制的結果，更造成了外勞對雇主形成固定的人身依附關係，資方無需透過市場競爭手段以工資或福利待遇等條件來吸引外勞，外籍勞工也因此失去了在勞動市場自由流動，用腳投票的可能，致其勞動契約猶如一紙買賣契約。²⁴

另一較外勞更被過度剝削的社群，或說，連被過度剝削都無法申訴的，是越界性工作者。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初期，台北市被查獲之越界性工作者，是以東南亞籍、北歐蘇聯等外籍女子為主，近年來則以中國大陸的女子為主。據 2001 年台北市擣妓勒贖案發生時的報載，大陸籍來台性工作者約為 2 萬人，佔每年來台大陸人數的至少十分之一，由於沒有語言障礙而十分受歡迎，一年約可創造 1,500 億的產值。大台北地區四大應召站下的性工作者有九成以上是大陸籍。由於越界性工作者處於非法身分，從事性工作且非法打工，因此多遁入地下，且因為社會與政府未提供任何協助，社工與公共衛生無法觸及，使她們處於資訊的黑箱，不得不倚賴人蛇集團或應召站業者，不僅被過度剝削，又因非法打工與性產業入罪化的結合，導致人蛇集團與警察共謀貪瀆，爆發「擣妓勒贖」案，使得越界性工作者處於勞動力被剝削與人權被侵犯的雙重弱勢。²⁵然而，台北市政府的處理方式是將越界性工作者視為嚴重的犯罪問題，將擣妓勒贖案視為是警紀問題，而以「加強掃黃」為政策。這使得越界性工作者在雙重弱勢之餘，又處於被社會嚴重污名的處境。

我們選擇特定社群探討社會片斷化問題，意在突顯北台都會區域的全球化過程中，那些被視若無睹卻產生干擾、令人不安的部份。我們界定經濟全球化的主要作用者是那些有能力處理流動的企業家；我們所探索的外籍勞工、越界性工作者，並不是被全球經濟跳過的沒有利用價值的人，相反的，他們原本擅於流動，主動參與在全球化經濟中，成為北台都會區域全球化的一部份，但他們僅僅被當作商品來看待，他們的移入被「輸入」這個字眼取代，在「輸入」後被剝奪流動的權利。他們的社會排除處境，是來自於其「外籍」與「商品」的雙重身分，是北台都會區域的全球化過程的產物：後進者如北台都會區域，關注自身的流動問

²³ 參考戴伯芬（2002），〈台北的經濟再結構與國際移〉，全球化台北研討會，台灣大學，2002 年 10 月 13 日。

²⁴ 參考吳比娜（2002），工作報告；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3），《修定台北市綜合發展計畫：全球化趨勢下台北市空間發展目標與策略研訂》，夏鑄九主持，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委託

²⁵ 夏鑄九、顏厥安、王增勇、與王卓脩（2002），《我國性產業與性交易政策之研究》，台北：行政院內政部婦女權益促進會委託

題，卻忽略了越界勞動者的問題其實是個移民問題，根本上也是一個貧窮問題——貧窮造成的勞動力越界流動問題。

6. 結論：對全球網絡中的都會區域與城市的一點討論

1. 做為全球網絡中的節點，北台都會區域歷史性浮現，卻為都會治理所苦：空間集中與空間蔓延同時發生，亟需都會區域協調，成長管理，回應都市問題，卻困於中央集權格局與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的局面，難以有效治理。

全球網絡中的北台都會區域歷史性浮現了，台北市若欲立基於現實，應以此自我定位，開展其各項策略性規劃。我們要面對的都市現實是：沿著台灣西海岸，一個都市連續體，由台北、台中到高雄，以三個都會區為中心，其中尤以北台區域為首要核心，聯繫起城市、城郊與城鎮。若就人口與產業的角度審視，北台都會區域的確出現明顯的集中化，但是，若在北台都會區域內，則發現空間的集中與蔓延，可謂同時並行。譬如說，資訊（信息）化城市，也就是“全球網絡的節點城市”，所需的企業服務業經常表現為功能性的空間集中與分工，以及，經由看不見的網絡節點，又與全球網絡中的其他都會區域彼此連結，亟需土地與勞動力的勞力密集產業就表現為都會區域境外的越界投資模式，而住宅房地產則經常表現為空間蔓延。因此，在都會區域裡，原來的個別的城市並未消失，但是，它們做為一個都會區域 (metropolitan region)的組成部分，這些城市的功能與特性都正在被重新界定的過程中，這裡是納入全球網絡中的不同節點(nodes)所構成的多中心的都會區域(multi-centered metropolitan region)。例如，基隆市的功能與角色轉變，它雖是北台都會區域的出口港市，可是它更是台北市的居住與休閒功能的城郊的一部份了。台北縣的淡水鎮則快速由一個大學城轉化成台北市的臥房城市。而原來是傳統製造業集中的台北縣、桃園縣一些工業城鎮，目前正處在企業外移、勞工失業的風暴中。再例如，台灣高鐵的作用就會十分關鍵，可以預期它勢將重構台灣的領域結構。在高鐵的巨大流動力量帶動下，整個台灣西海岸將建構為新的都會區域，它的速度也會給兩側環境帶來前所未見的衝擊，只是，做為一個曾是全世界最大的 BOT 案，它的財務計劃將是其執行過程的最大挑戰。不幸地，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與近兩年台灣經濟的衰退，均在在增加了執行的困難。更何況，政府行政配合的經驗與能力又不足，於是，規劃執行過程中過度的政治扭曲，不但造成場站設置的干擾，也將減弱它們做為節點的流動功能，像台南縣、高雄市等等的場站設置都有爭議。²⁶

²⁶ 可參考：溫若章（2001），國家轉型與運輸規劃：台灣南北高鐵政策規劃過程之研究，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更進一步審視，新的運輸與電信系統可使這些都會區域在領土內部相互聯繫起來，以及同時更重要地，連結起世界上其他相似的區域：台北新竹、加州矽谷、與中國大陸沿海的都會區域（主要是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之間，可說經由**越界的生產網絡**(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已經形成了垂直分工，彼此在全球網絡中連結成不連續的區段(segments)。在全球生產網絡結構中，關鍵角色是企業，甚至就是“網絡”本身，因此，企業全球佈局的策略是，台灣企業以優異的製程研發與品質控管能力，做為產品創新的美國與製造業大量生產基地的中國大陸之間的全球網絡接合點。

此外，這個越界生產網絡除了製造業的技術優勢，金融服務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簡言之，台灣的競爭力正在於台灣企業有能力，順利穿透邊界跨界生產，以及，搶先佔領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這些活動大部分都有賴於幾個主要的都會區域的節點間的全球網絡間進行。²⁷於是，全球化地理學可說是由餘留剩下的農村區域所依賴的，**大都會區之間連結的網絡**(networks)所造成。

當前，接合全球網絡的都會節點(metropolitan nodes)的重要性使得城市管理的新形勢在於每個城市都得將自己準備好以面對全球競爭，因為經由恰當的政策調節，市民福祉仰賴其中。在這個新空間結構下，生產關係、階級關係、權力關係、與文化體系都被重新界定，而過去的社會科學，面對巨變的新形勢，其實無能提供指導規劃與設計實踐的理論架構。²⁸

我們可以先就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辯論做為反思與反身性思考的起點。無論是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西方文明衰頹對發展、現代化與文明間的基本假設，還是羅斯拖(W. W. Rostow)在國際冷戰時期對都市化、現代化、與西化間的連結，都關係著發展範型。它們認為，人類發展的模型為西方工業資本主義的經驗所吸收，西方文明有一種空間的形式，人口與活動的空間集中過程，即，**城市(cities)**。在某個程度上，這主張是一種對“發展”的歷史單行道觀點，是剩下來的世界必須遵行的西方世界經驗，而**都市化是一種未經檢驗，被過份簡化了的正面元素**。

可是，現實裡世界層次的不均發展使得國際學界與政治領域在 1960-70 年代的發展辯論必須正視可能的另類出路：

²⁷ 由這個角度言，三通是台灣越界企業降低成本增加競爭力的根基，弔诡地，也因此，才強化了企業根留台灣的土壤，而非反是。用通俗的話說，若任由認同政治無節制地上綱，最後是連研發部門也留不住的，受傷的將是台灣的經濟與社會。因為，台灣的企業已經累積了一定程度的製造業製程與管理的技術，是有優勢全球流動的，即是會有其他的都會區域中的生產節點歡迎他們著床落地的。

²⁸ 譬如說，西方社會都市化的老模型，在規模與形貌上都與中國當前這個加速的都市化過程不夠吻合。同樣的發展更大規模與更快速地發生在華南、華東與華北，只是越往南，越早一步納入全球經濟，這種都會區域的特性也越清楚。例如在香港與廣州之間，經由深圳與珠江三角洲，聯繫起珠海與澳門；在長江三角洲，以上海與南京之間，經由蘇南、浙北與長江北岸，聯繫起杭州、寧波、昆山、蘇州、無錫、常州；至於在環渤海區域，京、津、冀北之間，都是正在形成的鉅形都會區域。

首先，第三世界都市化經驗中的大城市是功能脫落的系統，市場力量本身也不會產生空間結構上的均衡，於是第三世界的都市化是發生在區域不均衡的不均等發展(uneven development)脈絡中。

其次，**都市問題**有其特殊性，不能簡單化為經濟上的失業與貧窮。在第三世界國家往往即使有了發展與工業化，都市問題也經常在工業化過程中更為惡化，經濟發展過程造就了更多的問題，而並非是減少了。貧窮確實關乎經濟發展，然而也關係著社會力量不足以形成壓力，因此**政府缺乏回應**，所以都市問題惡化，每下愈況。

在這些結構性原因的限制之下，我們就必須得面對區域不均、都市裡的住宅與都市服務（集體消費）不足、非正式經濟遽增而非逐漸消失、公共空間品質不良、公共建築的表現形式重於內涵，成為浮誇的權力炫耀、傳統建築成為在現實城市裡像是失去了生命的空洞舞台，於是，破壞幾成為面對發展時，必然的急切過程與必要的魯莽手段，最後，現代建築成為僅僅是表面的、缺乏主體性建構的現代風格的移植，都市形式幾乎等於就是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象徵表現。這是**現代性(modernity)**在第三世界城市的建構，是**欠缺主體性的城市**（也可以說，缺乏市民身份認同的歷史浮現），²⁹是缺乏根植於自身社會與文化所孕育的反身性知識(reflexive knowledge)，所產生的欠缺調節與節制機制的**城市歷史**。³⁰

所有這些，都還是沒有解答的**都市問題**。³¹而今天，我們又沒有選擇地必須參與在共同面對廿一世紀全球資訊（信息）化眾多全新問題的大形勢之中。

就這個歷史脈絡言，以芝加哥學派的功能主義範疇為基礎的舊都市社會學，其實早就不能提供分析當前我們必須面對的這種快速與大規模的都市化所需的適當概念。甚至，即使在1970年代在法國發展的“新都市社會學”，也歷史地太直接聯繫著西方先進資本主義都市化經驗，而不太能吻合我們面對的，**當前都市全球變動的現實**。³²

因此，我們需要新的理論角度，以及新的實踐干預的規劃與設計做法，也是資訊（信息）

²⁹ 換句話說，主體缺席的現代性，沒有主體性的現代性建構，可參考：Hsia, Chu-joe (2002) “Theorizing Colonial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Building Colonial Modernity in Taiwa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3, No.1, pp.7-23; 夏鑄九, 2000, 12, “殖民的現代性營造—重寫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的歷史” (*Building Colonial Modernity: Rewriting Histories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the Colonial Taiwan*), *台灣社會研究*, 第 40 期, 頁 47-82; 夏鑄九 (本田親史, 漢田龍藏譯), 2001, 5, “殖民地近代性之構築”, *現代思想*, Vol.29-6, pp.23-60。(日文)

³⁰ 雖然宋代以後商品經濟發達，中國並沒有像西歐那種小公國或城市國家的歷史土壤，早期資本主義制度與城市形成的歷史過程與歐美殊異。至於與晚期的都市經驗，1960年代到1970年代歐美社會在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模型下，爆發了都市社會運動，提供了都市改革（都市改良主義）的政治土壤等，也極不相同，因此，不宜未經反省地簡單套用，但值得比較，做理論對話，以認識當前的社會空間轉化的新過程。

³¹ 而中國大陸，由於自身獨特的摸索非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經驗，這一段都市理論的辯論是缺席者，兩岸之間值得做進一步研究與對話。

³² 可參考：Castells, Manuel (2000) “Urban Soci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Susser, Ida (2000) *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p.390-406；以及，作者針對華文讀者所特別致意的一段文字，見：劉益城中譯，夏鑄九校訂，刊登於：*城市與設計學報*，第十三/十四期，2002年9月。)

時代專業教育的新範型轉移。³³注意，理論角度得永遠植基於紮實的經驗研究，以及，與規劃與設計實踐對話。研究者、規劃與設計者，要有能力認識與干預，正在塑造台灣、中國大陸、亞洲、以及最終全世界未來的社會空間轉化的新過程(a new process of socio-spatial transformation)。

2. 做為資訊（信息）化城市，具有創新氛圍的都會區域是全球經濟中競爭力的優勢所在：台北，也就是台灣，力爭持續做為運籌中心的角色，卻苦於認同政治的糾結，無法突破政治上的阻力，都會與地方政府或許在制度的彈性上有歷史的機會。

台灣的企業創新，受限於製造業編入新國際分工時的代工結構，在過去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雖然獲得了經濟成長，雖然提升了部分技術能力，但是多集中於製程與管理的創新，這是台灣前一歷史階段的競爭力之所在，也是當前在全球的越界生產網絡中取得區域優勢的關鍵，這就是全球網絡中的節點角色。

在這個脈絡下，台灣的經濟的確發展了，資本積累集中於製造業，再加上 1994 年開始，台灣的股市活絡，連帶使得資本市場的循環打造完成。由此，台灣金融業的實力，不來自銀行，而來自活絡的股市與有競爭力的製造業。

這一種經濟結構使得台灣的創新企業，多集中於製程與管理，而且都和該代工的原始廠商有直接的關係，同時成為調控生產網絡的工具之一。至於對於新產品的開發與創新，回應市場的變動等，並不會成為台灣企業創新的重點與方向，換言之，台灣的創意人才，並不被鼓勵投入這種創新。同樣地，此一結構也使得長期研發與基礎研究，得不到充沛的資源與耐心。

這個根本的結構，表現在設計產業上，文化創新產業上，生物科技產業上，都使得台灣的企業在原創的能力上低度發展，在市場調查、產品開發、品牌行銷等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足。但是卻在製程創新（新產品最快量產、品質最穩定）以協助獲取代工訂單上，展現無比的能力與靈活性，成就了台灣企業的競爭力。

因此，也許台灣企業創新的問題，不在於缺乏原創力，因為所謂的原創力需要一定的社

³³ 在規劃教育之外，坦白說，面對全球化與資訊（信息）化的新形勢，近年的建築實務，特別是建築教育的形式主義傾向實在是近代規劃與設計教育歷史上最保守的態度與最逃避的表現。以設計教學為例，它與其社會與歷史脈絡的研究之間本來就存有緊張的關係，也經常表現在課程設計，甚至是學院教師間溝通的困難。但是無論如何，建築教育不能拒絕網絡社會的變化，自我封閉於狹窄的，形式的技術性操作本身。這會限制了下一代年輕建築工作者的出路、視野與摸索新可能性的能力。美國現代建築教育的範型轉移過程中，後現代建築的先行者多出於早年普林斯頓大學建築系，巴黎美術學院出身的教授拉伯度門下可為一例。建築教育真正的挑戰在於接合研究者的分析性知識與設計者的形式展現，即，空間的文化形式，或者說，象徵性表現的能力。固然現實裡的建築師多只會做而不會說與思，但是教育需要有視野，不能只是眼前的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尤其在網絡社會裡，專業者最重要的能力莫過於面對新情境的調適能力，而不是迅速過時的技術訓練。關於網絡社會的建築教育，可以參考：夏鑄九(2001)，“在鉅型城市中爭論空間的意義：論全球資訊化社會的建築教育”，梁思成先生誕辰一百週年紀念學術報告會，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4月 28 日。

會制度支撐，而在先確認台灣在國際生產網絡的結構性位置，以及因之而產生的社會制度的特性。所以政策擬議的核心問題毋寧是如何導引企業創新的能量，使得它能在要害處服務於台灣主要領導產業與全球經濟的接軌，同時提升競爭力。

至於台灣的競爭優勢要如何繼續確保呢？這原是台灣企業的問題。在區域優勢的課題上，我們的答案是：納入全球經濟幾乎是一條歷史的不歸路。至少在“目前的”歷史與政治條件下，有如過河卒子，只有在全球網絡中拼命向前。這也就是說，咬緊灣區矽谷，力求技術升級，爭取產業轉型，進一步整合在中華經濟圈(the China Circle)中，成就為運籌中心，取得全球經濟競爭中的優勢，沒有其他的選擇。而非以過了時的國民經濟觀點，自我封閉，弔詭地，這反而會急遽脫落於全球網絡，造成所謂的產業空洞化。

由全球城市的競爭性接合角度來看，兩岸關係得從全球經濟的角度來重新理解：**越界的城際互動將成為主要的都市經驗**。經由**越界的生產網絡**，中國大陸的市場規模與優良生產基地是台灣企業的技術升級機會。然而，面對全球化的不確定性壓力，營造民（國）族國家的政治動力與跨界投資所表現的經濟動力之間，在目前台灣的現實政治與社會條件下存在結構性矛盾。³⁴認同政治確實可以動員地方的力量，然而，台灣的歷史角色其實能選擇的空間不多。**兩岸經貿間的巨大資源必須巧妙地轉化為政治的利益**。做為全球城市的台北，甚至是全球網絡中的北台都會區域，如何有能力在全球競爭的過程中有效地動員人力資源，扮演好競爭性接合在全球網絡中的節點角色，是台北市，做為**地方與區域政府**，可以在城際網絡(intercity networking)中具有的歷史機會。這些機會，有時甚至是地方政府的制度彈性與優勢，也是中央政府所無從發揮的功能。這也就是說，文化與經濟活動先行，越界的城際網絡將推動新的城際活動，弔詭地竟是它，越界的流動空間，回過頭來將決定城市市民本身的福祉，改善定著的地方空間。

3. 快速的都市發展積累了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與社會排除所造就的片斷化城市：環境保育，古蹟保存（保護）是對發展(development)的反身性(reflexivity)能力在空間領域上都市魅力的展現，**城市的公共空間**則是不同社會主體間傳播與溝通規則建立的管道，而肯定市民**城市**的力量與追求可持續**城市**的力量可彼此相合，這是落實執行的政治與社會空間。

台灣的生態問題來自過度的人口集中、快速發展下對土地與城市管理失控。而快速的都市集中，又是台灣納入新國際分工，經濟快速發展的平行產物與發展代價，因此藉由發達國家的技術手段，如成長管理與都市計劃等制度橫向移植，過去均成效有限。然而，隨著資本

³⁴ 參考：夏鑄九，2001，12，“全球化過程中台灣社會的挑戰：跨界的生產網絡 vs. 跨界的政治”，*都市與計劃*，第28卷，第四期，頁413-420；夏鑄九，2000，03，“全球經濟中之跨界資本：台灣電子工業之生產網絡”，*城市與設計學報*，第11、12期，頁1-37。

主義的新階段與全球經濟，推動了台灣的空間結構的巨大變動，現在，反而是生態問題轉化的契機。面對這種契機，最重要的是在前述的**技術升級契機與產業轉型**的動力下，能先跳脫以往為了經濟發展，短視地犧牲環境，破壞生態的觀點，提出能連結文化與生活的新的生態觀。一方面，經由**跨界生產網絡，提升企業競爭力，改變原有的製造業代工角色**，另一方面，**提升生活空間的品質**，經由都市政策層次的成長管理、都市計劃與都市設計的制度性干預手段，以**可居的城市(livable cities)與都市魅力(urban attractors)**，做為追求**可持續城市(sustainable cities)**的過程。

營造可居的城市與魅力城市，追求可持續城市的過程的主要動力來自肯定**市民城市**的參與積極性，這裡也包括了致力打造女性主義城市的活力。對剛進入新世紀就面臨經濟不振的台灣社會言，離自由主義者想像的政治穩定狀態還很遙遠。表面上，台灣社會力量的釋放似乎在民進黨新政府取得中央政府執政權後暫時削弱了抗議與抵制的能量，但是，因為執政成果令人失望，社會運動的動員與組織餘溫猶存。

譬如說，台灣社會劇烈變動的過去十年，教師為其工作神聖性的說法所制約，持續發揮其勞動力生產與意識形態再生產功能，成為穩定社會的保守力量。然而，在2002年9月28日教師節，竟然首次走上街頭，爭取組織教師工會，保護其自身的利益。而台灣社會結構中的其他行動者，它們早已學會爭取其自身權利的能力，這種學習能力的進一步挑戰在於：

勞工運動與農民運動雙雙暴露了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這是對社會排除的抗議，也是對政府執政能力的懷疑，嚴重傷害了國家的正當性。

都市社會運動爭取改善社區的生活空間品質所必須的都市服務、地方文化認同與決策過程開放，重新塑造都市政策，建立市民認同，重新定義其自身的社會位置，與國家的關係間取得社會自主性，藉此尋求社會結構的改造。

原住民運動爭取自治區，保存自身獨特的文化，卻不被漢族中心主義所污名，不被統治者的分化所苦，在地方發展的市場利基與可持續性發展間政策之間取得動態平衡點，從而逐步自我提升，轉化社會結構。

此外，婦女運動能避免中產階級的保守立場與婦女勞工、妓權運動間的撕裂。環境運動能在反核四、環境議題上不為統獨議題所分裂。**社會運動**不會消失，值得放在發展中國家都市生活裡文化轉化(cultural transformation)之後，在文化與社會的轉化力量支持下，做為孕育**主體性建構**的必須條件，以**反身性的動態知識超越地方主義(localism)**的限制。

前述韋伯對西歐城市(cities)觀點，指涉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與文化表現**，那麼，假如我們不接受歐洲中心主義潛藏的種族主義偏見的話，做為東亞新興工業

體的台北，其實在這些年都市運動的土壤上崛起的**市民認同力量**，倒是有值得與西歐城市的經驗對話的地方。舉例來說，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推動的地區環境改造計劃與社區規劃師制度，以及，都市計劃與都市設計審議制度中市民參與機制的設計，都可以視為制度層次上的改革成果。至於推動改革的重要力量，當屬藉著前些年台灣政治與社會變動的空間，同時浮現的都市社會運動，1989 年的住屋運動可視為有里程碑意義的起點。³⁵

尤其，社會排除過程產生**“社會片斷化”**，是全球化經濟發展的重要社會效應之一，特別用以對應全球化後之產業及就業結構的新變動。全球化經濟發展的網絡連結，跳過許多沒有利用價值的人與區域，加劇經濟不平等發展趨勢惡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為福利國家願景的衰退，一方面是國家無力對抗跨界的經濟發展，一方面福利國家亦疲於應付勞動市場零碎化衍生的諸多**失業人口與社會問題**。

全球化的趨勢中，台北市在尋求全球產業定位和城市競爭力的同時，應特別注意**全球化與社會排除為一體兩面**，社會片斷化不僅是社會安全和社會福利的問題，同時也是社會整合和進步的障礙。這時的社會整合已經不再是二十世紀前半葉芝加哥學派所致力的，忽視**都市經驗的多樣性**，忽視**都市文化的多重性**，以政府行為干預人民生活，將次文化同化(assimilation)，進行“一個”都市文化的整合工程。相反地，在**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³⁶與**網絡切斷(switch off)**、**繞道而行(bypass)**的兩極化城市壓力下，由於個體的**區段化(segmentation)**與集體的**片斷化(fragmentation)**趨勢，開放市民參與，鼓勵**多重符碼間的溝通、傳播、通訊能力(communicability of multiple code)**，再定義**公共空間(public spaces)**，使其成為自發地社會互動的基地與城市生活裡的溝通、傳播與通訊手段，在個體化都會中增強**公共空間的社會交往性(the sociability of public places)**。³⁷當我們有能力將流動空間進一步草根化之後，不同的社會主體之間也可以建立傳播與溝通的規則，那麼，建築師在空間的象徵性表現方面，仍然可以在建築的紀念性與公共空間的意義競爭上一展所長，而這不是建築的新角色嗎？台北市做

³⁵ 關於無住屋運動的意義，可參考：夏鑄九(2002)，“一個都市社會運動者的前世今生”（李幸長，小卒變英雄，序言），台北：皇冠；關於台北市大理街社區爭取公園的個案，可參考：Cheng, Lucie, and Chu-joe Hsia, Hsin-chun Chen, Po-fen Tai, 2000, 11, “Toward a Citizens' City: The Dali Community Movement of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Re-inventing Global Cities, The Centre of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Hong Kong, Nov. 11；關於台灣的都市運動或社區設計浮現的一個鳥瞰，可參考：Hsia, Chu-joe, 1999, “Theorizing Community Participatory Desig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Democratic Design in Taiwan”, in Randolph T. Hester and Corrina Kweskin eds. 1999, *Democratic Design: in the Pacific Rim, Japan, Taiwan and United States*, Mendocino Press, California: Ridge Times Press, pp.14-21.

³⁶ 關於台北都會區的都市原住民的住宅問題，可參考：Hsia, Chu-joe, 2001, “Social Inclusion/Exclusion in a Sustainable City: Housing Problem of ‘Urban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pei City” , in Genevieve Dubois-Taine and Christian Henriot eds. *Cities of the Pacific Rim: Diversity and Sustainability*, Lyon: PUCA, pp.145-153.

³⁷ 可參考：Castells, Manuel (2000) “Urban Soci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Susser, Ida (2000) *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p.390-406；以及，作者針對華文讀者所特別致意的一段文字，見：劉益誠中譯，夏鑄九校訂，刊登於：城市與設計學報，第十三/十四期，2002 年 9 月。）

爲一個入口城市(portal city)，它的機場、車站、港口、虛擬網站、甚至是高速公路收費站，都是越界流動者，辨認地方的公共空間，因此，對不同主體的社會行動者言，既是溝通傳播之道，也是意義競爭的空間。

這一切，都在在要求地方政府要變成更有彈性的制度行動者，不再是傳統的國家對社會的統治者，而是協調者與組織者作用，這也是台灣的都會治理(metropolitan governance)課題的挑戰。³⁸這其實是國家角色的轉化，就台灣的政治與歷史條件來看，國家角色的轉化只會在台灣社會自主性提高的歷史條件上才得以進行，而其基礎就是市民城市的都市政治。這關係著城市的角色與都市意義競爭的空間(contesting spaces of urban meanings)。這已是歷史的問題，也是理論的問題，是值得與國際學界做進一步對話的。

³⁸ 關於都市治理與城市重建，可參考：夏鑄九(2002)，“當前台灣的領域治理：問題與展望”，地方自治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公法學研究中心等主辦，台北，2002年9月25日。